

國學小叢書

魏 晉 詩 歌 概 論

郭伯恭著

著作  
編者  
郭伯恭  
王雲五

國學小叢書  
魏晉詩歌概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

(82104)

小國學叢書  
魏晉詩歌概論一冊

每冊定價國幣肆角伍分  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 郭伯恭

發主行編人兼 王上海雲河南五

\*\*\*\*\*版權所有必究\*\*\*\*\*

印 刷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 
發 行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 
上 海 及 各 埠  
董雲霆 沈宮抱秀

(本書校對者  
董雲霆  
王永榜  
沈宮抱秀)

九〇九上

平

目錄

# 第一章 總論

魏晉詩歌時期之劃分——魏晉的歷史背景與文學思潮——五言詩的起源和建安詩壇的關係——魏晉詩歌演變的趨勢

第二章 建安時代之詩壇 ······ 二九

詩壇中心的曹氏父子——爲其羽翼的建安七子——他們共有底悲觀的人生觀及其構成的因素——建安詩歌之形式方面的考察

第三章 正始時代之詩壇 ······ 八四

——正始前後之詩壇概況及當時社會上藥和酒之盛行——曹叡何晏與左延年——竹林名士中的嵇康阮籍和劉伶——吳蜀詩人之消沉——繼建安享樂主義而起的玄談之風

第四章 太康時代之詩壇

太康時代詩人之盛起——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——同時代的二傅及其他小詩人之羣——藝術上的天然美漸趨於人工美

第五章 永嘉以後之詩壇

永嘉以後詩歌之玄化——劉琨盧諺與郭璞——孫綽許詢以次之作者——佛教哲理之入詩及方外詩人——晉詩之殿後將軍陶潛

第六章 結論

古體詩之黃金時代——四言詩之復興及沒落——魏晉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之地位

# 魏晉詩歌概論

## 第一章 總論

魏晉詩歌時期之劃分——魏晉的歷史背景與文學風潮——五言詩的起源和建安詩壇的關係——魏晉詩歌演變的趨勢

### —

兩漢文學，只有矯揉造作的辭賦，撐住了很久的門面，詩歌簡直是提不起來的。直到東都末年，貴族的勢力一天衰敗一天，逢迎阿諛的文人一天減少一天，那些富麗堂皇的古典主義的辭賦，才漸漸少有人作。這時民間流行的自然樸實的樂府，以及由樂府產生出來的五言詩，就慢慢地抬頭來；先由一班摹古文人出來仿作，雖然僅披上了五言的外衣，格調不很高邁，但詩壇的風氣畢

竟轉移了。到了建安詩人手裏，五言詩就逐漸獨霸詩壇，歷魏晉六朝以至初唐，風行了約五百餘年（西元一九六——七一〇），擴張到無所不包的境界，佔有它在詩歌史上最燦爛的地位。所以魏晉六朝實是五言詩最光明的時期；魏晉是古體詩的鼎盛時代，六朝是新體詩的發展時代。我們再以詩歌藝術的演進來看，則魏晉却又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大時代，結束兩漢古典主義的詩歌，而開展出六朝浪漫主義詩歌的新局面。那末，我們要研究中國詩歌，則魏晉時代就是最應該值得探討的。

魏晉時代，在政治方面，依然繼承着東漢末年的紊亂，更加以學術思想的隆替，社會生活的進化，故在詩歌的趨勢上，遂形成了歷史的演變。昔人論這個時期的詩歌，因各朝代作風之不同，多區之為建安體、正始體、太康體、永嘉體等；在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和鍾嶸的《詩品》，以及沈約的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裏，差不多都是這樣。若照着它的演進的狀態來說，我以為可分為四個時期：

一、建安時代（西元一九六——二二七）

二、正始時代（西元二三二——二六五）

### 三、太康時代（西元二六五——三〇七）

#### 四、永嘉以後（西元三〇七——四二〇）

這第一個時期是起於漢獻帝建安元年（一九六）包括魏文帝黃初，止於明帝卽位（二二七）。第二個時期起於明帝太和元年（二二七），包括廢帝正始，元帝景元，止於晉武帝代魏爲晉（二六五）。第三個時期起於晉武帝泰始元年（二六五），包括太康元康，止於懷帝卽位（三〇七）。第四個時期起於懷帝永嘉元年（三〇七），包括元帝渡江，一直到劉裕改晉爲宋（四二〇）。時期的長短雖然不一致，但這是依照着政局之轉移，詩歌之演變，不得不如此的。又建安是漢獻帝年號，似不應拉在魏代來講，可是魏代黃初詩人全成名於建安時期，並且建安的政治實權也握於曹操之手，不惟在詩歌史上看建安是啓後而不是承前，就是在政治史上看建安也早已易漢而爲魏了，所以我覺得還是這樣區分的好。而且照着這四個時期去看，各時代作風之蛻變，也很容易尋找出它演變的軌迹來。

## 二

文學是社會上一切意識形態中的一種，其變化與任務，全以社會的轉移為轉移，文學不能離開時代，時代的轉動便是造成文學的基本條件。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精神，真正的時代的文學，便能够活現出那一時代的社會背景來。那末，我們要研究魏晉詩歌，則必須先行明瞭魏晉時代的社會背景，然後才不致有所隔閡。

要敘述魏晉時代的社會背景，又必須上溯漢末的政治狀況，因為建安時代混亂的導火線，原是起於靈帝中平年間（一八四）農民暴動的黃巾之亂。本來，封建社會走進商業資本發達的階段，農民受了地主和商人的兩重剝削而陷於極貧困的境地之後，必然地會引起他們極激的反抗，而形成廣大的階級鬥爭。這是歷史上的公例，無論西歐或中國都是如此。靈帝時代農民與統治者的鬥爭，雖然不久就失敗了，但統治階級却因此鑒於州郡的威力太輕，便派中央重臣出任牧伯；於是給各州郡造成了擴張勢力的機會，使皇帝的專制權威日益衰退，撒下了後來羣雄割據和戰亂

的種子。西元一八九年，由於誅滅宦官的事變，便演成了董卓的擅權廢立；而董卓的一意孤行，更引起時局的不可解的糾紛。曹不典論自序說：

初平之元，董卓弑主媯后，傾覆王室。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，兼惡卓之凶逆，家家思亂，人人自危。山東牧守，咸以春秋之義，衛人討州吁於濮，言人人皆得討賊。於是大興義兵，名豪大俠，富室強族，飄揚雲會，萬里相赴。兗豫之師，戰於滎陽，河內之甲陳於孟津。卓遂遷大駕，西都長安。而山東大者連郡，中者嬰城邑，小者聚阡陌，以相吞滅。會黃巾盛於海嶽，山寇暴於并冀，乘勝轉攻，席捲而南，鄉邑望煙而奔，城郭覩塵而潰，百姓死亡，暴骨如莽。

從這段話裏，我們可以看出那時普遍全國的變亂，真是不可收拾的了。而各個勢力的割據爭奪，連年不絕，結果因曹操的雄才大略，把所有羣雄次第吞併，在那樣混亂的局面下，又慢慢造成他一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。從此社會上的一切，當然更淪入恐怖驚駭的境地中了。

當曹操先後撲滅袁紹、袁術、呂布、張繡等之後，威勢極盛；惟獨奔荊州依附劉表的劉備，及龐兄之龐蔚爲江東重鎮的孫權，還沒解決。二〇八年，曹操攻下荊州，劉備奔到夏口，得了諸葛亮的遊

說，遂合孫權之兵，并力破操於赤壁；從此操的兵力不能越過長江，遂形成了三國之鼎立。操敗後，變更計劃，收復涼州、漢中諸地；二一六年，自進爲魏王，勢燄仍高。及二二〇年，操死，子丕繼位，遂公然逼漢帝禪位，改國號魏。這時候，劉備已奪得巴蜀、漢中之地，聽說曹丕篡漢了，便也於二二一年，即帝位，國號蜀。同年，孫權也自稱吳王；到二二九年，又即帝位，國號吳。於是魏蜀吳三國的局面，才算正式的展開了。

三國鼎峙以後，各方爲求私慾的滿足，和地盤的擴張，便又拿着戰爭當做家常便飯。曹丕的大舉伐吳，諸葛亮的六出祁山，姜維的九伐中原，以及二三四年吳蜀會師大舉攻魏等等的戰爭，都更給與社會一極大的不安。但吳蜀自劉備、諸葛亮、孫權、陸遜，相繼歿後，便無政治人才；而魏則自二四年曹爽被誅後，國權完全操於司馬懿之手。及懿死，子師昭相繼執政，遂於二六三年出兵從閬道攻蜀，備子禪出降，蜀遂亡。次年，司馬昭進爵爲晉王；未幾，昭死，子炎嗣，於二六五年，迫魏禪位，國號晉，於是蜀魏皆亡。惟權孫皓據江東一帶，仍稱帝號，驕淫暴虐，政治紛亂；晉於二八〇年遣師入吳，皓出降，吳亦亡。至此打破了紛爭數十年之三國局面，中國又復統一於一姓之手。

在上述的情況之下，所經過的大戰已那樣之多，其他小戰，更不知有多少次，各個勢力的消長，真是此伏彼起，無有已時。我們試想在那廣大的戰區，和那長期無休止的戰役之下的民衆們，還有安居樂業之可能嗎？不用說廣大的下層階級的窮苦民衆，爲了戰爭所驅使，所迫害，要大批的死亡，流離；即那些上層階級領有土地的貴族們，也要因社會秩序極度的紊亂，而失去了舒適生活的全保障，常陷於流離失所的困境中。人民生活在那驚濤駭浪的時局裏，震於環境的壓迫，感生命的飄浮，心靈上所受的創傷，自非平日所可比擬。所以在這時代的苦悶下迸發出來的呼聲，也就是時代不息的變動所產生的結果。而這種迸發出來的慘痛的呼聲，決不是歌頌治世的辭賦以及沒落了的詩型所能表達其萬一，必須以另一種活躍的新詩型，始能表現出這個大亂時代的一切新現象與新思想。故魏代的文學主流，就全在新詩型的五言詩方面。這種作品，已不似漢人的一味安閒，阿諛媚世，在內容裏，實已蘊藏有當代多量的亂離成分了。這並不是我的新發現，劉勰在很早就已說過。文心雕龍時序篇說：

自獻帝播遷，文學蓬轉。建安之末，區宇方輯。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愛詩章；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

善辭賦；陳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筆琳瑯；並體貌英逸，故俊才雲蒸。仲宣委質於漢南，孔璋歸命於河北，偉長從宦於青土，公幹徇質於海隅。德璉總其斐然之思，元瑜展其翩翩之樂。文蔚休伯之儔，子儼德祖之侶。傲雅觴豆之前，雍容衽席之上。灑筆以成酣歌，和墨以資談笑。觀其時文，雅好慷慨；良山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，並志深而筆長，故梗概而多氣也。

他認定魏代文學的慷慨多氣，是由於『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』的影響，可知文學不能離開時代，而時代的文學作品，必能將時代的精神愈深刻的呈現出來。魏代有魏代的時代背景，故魏代有其獨立的文學作品。

在以前，文壇上只有古典主義的文學，建築在封建社會之上。這種古典主義文學的核心，也就是自戰國以來傳下來的禮教，在兩漢長治久安的時候，禮教還能够維繫人心。到漢末黃巾之亂的導火線一經爆發，社會秩序即已崩潰，禮教之在人心便無能為力；並且古典主義的文學，到漢末也發達到極點了。於是一般人的思想解放，號為正統的古典主義的文學就漸漸消歇，而浪漫主義的反動也就立即到來。所以魏代的詩人，除了少數為了階級的支配仍然繼續維護禮教外，大多數都

走上了反古典主義的道路：孔融的跌蕩，何晏的放誕，以及竹林名士的縱酒，可以說都是以禮教爲唯一的攻擊目標。他們不管統治者是怎樣的憎惡，也不管士大夫們是怎樣的唾罵，只注重自我内心情緒的發洩，絲毫不受一點束縛，一點顧忌的來揭發社會的黑暗，來暴露人世的污濁。於是所謂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，便在當時逐漸的形成了。

到了晉代，司馬炎雖以武力打破了三分的局面，然因鑒於曹魏以孤立而速亡，乃採封建制度，大封宗室，加重其權，使得任命官吏，招募軍隊，遂逐漸又養成尾大不掉之勢。及武帝死，子惠帝嗣立，性情癡騃，子婦賈氏卽擅竊威權，紊亂國政，激起了汝南王亮，楚王璋，趙王倫，齊王冏，長沙王乂，成都王穎，河間王顥，東海王越等八王，先後起兵，互爭帝位。那時擁兵的宗室，幾乎全部加入，互相殘殺，一直達十六年之久，史稱之爲『八王之亂』。這骨肉相殘的慘劇不斷地出演，因之晉室的元氣也斷傷殆盡，而矯居北方的胡族就乘機侵擾；由此而後，那五胡亂華的故事，便一齊出現了。

所謂五胡，就是鮮卑、匈奴、羯、氐、羌等，五個民族。當漢代盛時，他們或爲所吞併，或爲所降服，漢人對於各族之降屬者，遷其民於內地，欲使之同化；其後族類繁衍，遂與漢人雜居於北方邊地一帶。然

漢人對於他們任意奴使，不加教養，在政府無事的時候，他們尙有所畏，及政府無力統御時，他們便思作亂暴動，脫離羈絆。所以晉武帝時，侍御史郭欽上疏，就主張徙羌胡於塞外。他說：

若有風塵之警，胡騎自平陽、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、北地、西河、太原馮翊、安定、上郡，盡爲狄庭矣。宜徙內地雜胡於邊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。

由這幾句話裏，可以看出當日胡族雜居內地的情形。惠帝時，太子洗馬江統亦作徙戎論，與郭欽同様主張遷羌氏諸族於邊地：

當今之世，宜及兵威方盛，衆事未罷，徙馮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內諸羌，著先零、罕汗、析支之地；徙扶風、始平、京北之氐，出還隴右，著陰平、武都之界。

於此，更可見當時羌氏二族分布的概況。可惜他們二人的主張，朝廷都沒有採用。及八王之亂作，五胡遂乘機暴動而獨立，先後建國者達十六，史稱之爲『五胡十六國』。屬於鮮卑的，有前燕慕容氏，後燕慕容氏，南燕慕容氏，及南涼禿髮氏，西秦乞伏氏。屬於匈奴的，有前趙劉氏，北涼沮渠氏，及夏赫連氏。屬於羯的，有後趙石氏。屬於氐的，有前秦苻氏，後涼呂氏，及成漢李氏。屬於羌的，有後秦姚氏。餘

如前涼張氏，西涼李氏，及北燕馮氏。則爲漢族。自三〇四年起，至四三九年止，紛亂了一百三十餘年，始統一於拓跋氏，是爲北魏。

當惠帝時，匈奴族出了一個梟傑劉淵，乘八王之亂，據平陽稱帝，國號漢。其子聰嗣立，遣劉曜石勒來犯晉，在洛陽虜去了懷帝，又在長安虜去了愍帝，西晉遂亡。漢後改前趙，五胡亂中，以他最先興起。愍帝遇害時，瑯琊王睿鎮建業，遂於三一七年即帝位，偏安江左，是爲東晉。北方大族多遷往江左避難，但僅保有一隅，勢力不振。是時北方的五胡十六國，互相攻伐，吞併的結果僅餘鮮卑人之前燕，及氐人苻氏新建之前秦兩大國。秦自苻堅即位，用漢人王猛爲政，依次削平北方各國，併吞各民族，統一中原，到三八三年，便率『投鞭斷流』之衆，南下與晉爭衡，晉將謝玄等大破之於肥水，苻秦乃瓦解。其以前所吞併之各民族，復紛紛獨立，分裂爲七國。這次勝利，把晉室的威權恢復不少，正可乘勝直追，開拓中原，乃因藩鎮跋扈，悍將搆亂，此時繼演桓溫桓玄之變，因此沒有什麼發展。雖後來劉裕在討滅桓玄之後，乘勝平南燕，敗姚秦，但他全爲自己的皇位打算，沒等到把五胡驅逐於塞外，便引軍南歸，改晉爲宋，東晉亦亡。時爲四二〇年。

有晉一代，平定之日實少，八王之亂後，便一發而不可收拾；元帝渡江，更一面抵禦外侮，一面防備內訌，時局之應付，真是疲於奔命。而民衆們所直接遭受變亂的痛苦，也比以前更甚。那時禮教之在人心，自然也愈趨愈遠。因此，在文壇上便仍然繼續着魏代以來的浪漫思潮。雖間或有人一方面在專門摹仿古人，製造假古董，可是在另一方面却極真切的表現着亂離時代下的苦悶。劉勰在述晉代文壇之概況後，接着說：

故知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。原始以要終，雖百世可知也。

他不惟一口咬準文學的變遷，由於時代的關係，並且還推到未來，斷定永遠逃不出這個公例。這是何等批評的眼光！是的，文學的產生，多半由於時代的背景，故時代的背景，也就是文學的靈魂。無論任何人，不能逃出他的時代，那末，他的作品的表現，也就不能完全脫離與他的時代的關係。晉代文人的生活，與魏代正始相似，我們數一數那時的文人，有幾個善終的：張華、陸機、陸雲、潘岳、石崇、歐陽建、劉琨、盧諶、郭璞、殷仲文、謝叔源等，那一個不是被統治階級所殺？那一個得以安然享其餘年？至於僥倖而善終的，真是微乎其微了。所以當他們生前激於亂世混濁，見世事毫無可爲，遂多發爲憂時